

国家利益与国际一体化

陈剑峰 倪世雄

【内容提要】本文在肯定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前提下,以国家利益为基点,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分析国际一体化的不稳定性。同时对国际一体化、国家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进行了界定并说明了它们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一体化 国家利益 国际共同利益 冲突

当全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一体化的潮流之中。然而,国际一体化是在国家利益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起源。”^[1]在较大意义上,世界范围的商业和政治组织的增多不过是各国内部发展的必然延伸,所以,国际合作中势必存在着利益冲突。近几年,许多学者认为国际一体化进程冲击了国家主权,可是,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利益同时也对国际一体化起着制约作用。这是个矛盾统一体。

一、国际一体化与国家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认为,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国际合作,减少了国际冲突。孟德斯鸠认为国际合作可以“使国与国感到双方利益互补从而保持和平关系”。^[2]穆勒说过:“正是商业贸易交往才会使战争成为不可能。”^[3]自由主义这些观点说明国际交往是相互依存的手段,是国际一体化发展的条件。那么什么是国际一体化呢?卡普兰认为:一体化是这样一种调节过程,把具有各自机构和目标的系统和组织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为的是共同实现至少是某些目标,以及共同实施至少是某些政策。^[4]卡尔·多伊奇把一体化界定为:

由部分组成整体,将原来为独立的单位变成某一粘合系统的组成部分。^[5]国际一体化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这一框架内整合,由部分组成整体,把世界当作一个共同体从而实现国际共同利益——发展与和平。它是相互依存的更高发展阶段,是国际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是否能充分实现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如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和科技,防止核扩散,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等,都要取决于国际协调和国际一体化发展的程度。

与自由主义观点正好相反,现实主义对贸易往来能否产生和平与一致效应持怀疑态度。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一国参与国际一体化进程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使各自国家实力最大化。^[6]所以,国际交往越多,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就越多,两者为正向关系。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说的那样,“在相互依存中,冲突可能以新面目出现并且会有变得剧烈的趋势”。^[7]国家间不相同的利益对立导致国际冲突,而国际冲突却吞噬着国际一体化。

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争强权,“帮助政治现实主义进入国际政治领域的路标是以强权为利益这个概念。……利益观念确是政治的基本观念,是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8]只有当一国拥有很强的综合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保护和扩大个人利益。中国学者阎学通全方位地分析了国家利益,他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

与精神需求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9]更具体地讲，就是：民族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国际经济中的收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国内政治稳定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崇高威望等。

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既对立又统一。当一国试图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如在全球扩大自己的产品市场或寻求霸权，就损害了共同利益，二者就对立起来。当一国单独不能解决诸如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时，或者是当共同利益实现后各国都能得益时，如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二者就统一起来。比较起来，对立所造成的后果远远大于统一的结果。

国际共同利益的源头是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扩展和延续。正如黑格尔所说，“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导致了某种全体利益。”^[10]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趋于一致时，就产生了和谐，产生了国际一体化。修昔底德说过，“利益一致是国与国之间或个人与个人之间最牢靠的纽带。”^[11]然而，当二者相对立时，各民族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本国利益，因为国际共同利益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而存在的。国际一体化是国际共同利益的一个内涵，它的驱动力同样是国家利益。

二、国际经济 一体化的不稳定性

在现实世界中，世界市场被众多不同的并且通常又是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和民族国家所分割。各国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假设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几乎不能成立。每个世界市场的参与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各自利益。经济相互依存和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经常是用于有利于自主而不是有利于相互依存的方式加以解决。各国既希望从国际一体化中获益，同时又谋求限制它对国家自主的影响，各民族国家要求得到自由贸易的集体商品和维护稳定的货币秩序，而又不损害它们管理自己经济的能力。结果，各国之间扩大竞争，企业最大限度地增加各自收益，最大限度地缩小国际一体化使自

己付出的代价。所以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执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进攻性扩大出口的政策。每一个经济实力中心也都在利用国际体系为自己狭隘的目的服务。另外，政策协调与多边管理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主观上愿意与否及技术上是否可行，而是各个行为主体缺乏共同一致的目的和利益。纵观历史，合作往往是弱者，冲突则是强者。

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及其与北美之间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现在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当时各国之间的经贸、投资有了空前的发展。金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在国际社会扩展。只是当时甚至于二十世纪的理论家对这一经济态势没有看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罢了。

由于各个地区在一个全球专业化生产中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于是全球在经济上空前地统一起来。货物、劳务、金钱、资本和民间往来差不多不再顾及国界，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创立了。^[12]商品买卖价格在全球是一致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全球内出现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制。这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胜利。但因经济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国家为了在国际经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争夺资源供应地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与此同时，企业和私人都反过来依靠自己的国家政府来奴役弱小国家。这样，国家间就发生了利益冲突，最后不可避免地诉诸战争来解决纷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全球共同市场的美好前景。合作与一致被冲突与战争取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年的恢复，大约从1924年开始，全球经济又出现了繁荣景象，但被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敲打得支离破碎。这场危机的原因总起来有二，其一是自由贸易体系使世界经济失控；其二是国家间并不存在共同目标——维护国际共同利益，而只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危机后，在国家利益驱动下，各国仍然没有联合起来共同调节世界市场，反而以关税战，贸易战和货币战的形式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导致了全球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摧毁了理想主义者为世界所设计的美好蓝图。

凯恩斯主义使各国政府对各自的经济行为

进行有效干预。全球经济发展不再是以自由贸易为主流,而是各国政府宏观控制下的国际经济。民族国家的地位在世界经济中得以加强。如前所述,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频繁冲突从根本上阻碍国际一体化的进程。

当前世界处于巨变之中,多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世界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在继续深入发展。首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不断增长。美、日、欧之间经济贸易摩擦越发频繁、激烈。虽然通过谈判和相互谅解,在有些问题上国家利益让步于国际共同利益,但国家的根本利益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与日本贸易极不平衡,美国政府为了缩小巨额外贸逆差,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限制对美出口,开放日本国内市场。美欧在贸易方面矛盾也很尖锐。双方因农产品出口补贴、钢铁倾销税对立、实施制裁等,互不相让。其次,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在加深,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政治和经济关系越来越不平等。

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之一。一个国家的强盛和衰弱最终起作用的是综合国力,核心是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发展。科学技术应该是不分国界的,其发展成果也应属于全人类。可是,掌握着科学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的,是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心甘情愿地把科技成果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全球科技成果的普遍应用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发达国家认为自己的科技成果过时了,才肯向别国转让。科技发明专利和知识产权从另一个侧面讲对全人类科技水平普遍发展和应用起着制约作用。国际共同利益不是以极大地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存在的。假如是,中美之间就不存在知识产权的冲突。

三、国际政治一体化的脆弱性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两股力量:一个是民族主义力量;另一个是国际主义力量。二

者之间相互制约。让我们用凯泽的“纵向相互作用和横向相互作用”^[13]理论来分析民族主义对国际一体化进程的冲击。纵向相互作用指一国中央政府同自己的人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主义者主张高度的纵向相互作用,要求政府以民族利益为基准处理国际事务。横向相互作用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国际主义主张加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往来。提高国际相互依存程度,各民族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一体化的发展。如果纵向相互作用增强,而横向相互作用保持不变,那么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将会减弱,国际一体化程度就降低。冷战后,纵向与横向相互作用都程度不同地增强了。横向作用加强了国际一体化进程,而纵向又从反面影响了这一进程的发展并且造成局部地区动荡不安,如东欧和非洲的民族冲突,美国、德国及澳大利亚反移民潮都为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动力,削弱了国际一体化程度。

大国能在不受国际社会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其事,而大国关系又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大国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一体化的进程。在1918年到1939年这二十年里,主要趋势基本上是强调各国的支配地位,既从政治上又从经济上力图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全球的安全问题,国家的自给自足也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冷战后,军事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地位上升,敌友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各大国如美、中、俄、日、欧盟都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缓和相互间的矛盾。特别是去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俄罗斯总统和日本首相访华以及日、俄首脑在西伯利亚会晤为世界和平起了促进的作用。“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出现了,然而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因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国际一体化的向心力与主权国家的离心力之间的冲突。日本想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欧盟想摆脱美国,自己独立处理地区和世界事务;美国去年与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台出

售武器等旨在抗衡中国以便在太平洋地区继续推行霸权主义；俄罗斯在二十一世纪再一次强盛起来后将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呢？这的确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大国关系缘何如此复杂，究其原因就是不同的国家利益纵横交错，相互对立的结果。迈克尔·霍华德在《冷战，冷和平》一文中说：“每一次战争，不论是热战或冷战，都会出现一种冷和平局面”^[14]当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往往战胜国际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利益对抗所导致的危机。实质上，在历史上很难找出一个长久的，彻彻底底的和平。

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对国际一体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也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国际局势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萨拉姆·丘宾在《南方的世界秩序观》一文中认为冷战的结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是“大动荡”，他们“面临着安全和发展的问题。”^[15]以往南北只限于贫与富的问题，而不涉及南北安全关系。这充分证明发达国家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安全以及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除了经济上受损失外，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也处于被动的地位。国际一体化不只是发达国家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应是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一致。南北问题得不到解决，国际一体化将寸步难行。

从历史角度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会导致冲突与合作，但多半是冲突。这里并不想完全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文化的差异的确是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绊脚石。虽说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淡化了，可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各民族的文化趋同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两极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认为在全球取得了胜利，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发生了对抗。这种对抗使国际一体化更加步履艰难。摩根索说得对：“政策的真实性质（强权政治）被意识形态的辩解和文饰所掩盖了。”^[16]所以，民主和人权外交实质就是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强权。另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犹太复国

主义等等也兴风作浪，使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不同民族之间产生了猜忌和仇恨。文化冲突给国际一体化添加了分离剂。

四、结尾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国际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并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国际共同利益得到充分发展。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政治一体化。两极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政治合作也十分活跃。现代高速发展的科技，越发便利的交通通讯也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举世公认的成果。

然而，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致与冲突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古到今，许多学者从理论上想为人类走出这一困境找条出路，国际社会本身也试图在实践上束缚冲突乃至战争这一威胁人类生存的妖魔。从近代开始，世界相继产生了维也纳体系、国联、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中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可是冲突这一幽灵却无时不在地吞噬着人类的发展与和平。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成了国际社会主要矛盾。当今，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国家利益就不会自动消失。国家追逐财富，因为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要素；国家谋求实力，因为实力是获取财富的最可靠手段。从长远观点看，各国捕捉国家利益的热情大于谋求国际共同利益，所以，国际一体化的根基具有不稳定性。欧盟虽然在1991年向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步履很艰难。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且都不想过多地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英、法、德三架马车能否成功地在政治上套在一起的前景似乎很不明朗。这里想以理查德·罗塞克兰斯和阿瑟·斯坦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作个结尾，“不能应付高度必要的合作所提出的挑战就意味着有高度冲突的可能性。”^[17]

（下转第3页）

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这就需要在处理相互关系时超越这种差别,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减少分歧,求同存异,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不同,这就需要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样才能使双方更好地合作来维护共同的利益。

台湾问题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美国政府不能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并且要果断、坚决地排除美国国内亲台势力的干扰。

排除国内各种干扰,坚持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没有战略勇气不行。这对中美双方都很重要。对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来讲,对中美关

系自然会有各种看法,但从整体上说,都是希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当前主要问题是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外交往往受制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其中包括政府与国会之间、政党之间、政党内部派系之间以及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政府政策往往出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且容易变化无常,特别在对华关系方面。

要推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关键是要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正确认识两国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我们要共同努力,在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

.....
(上接第11页)

注释:

[1]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6,第569页。

[2]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 P.113, 195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 Mill, John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582, 1909 Longman, London.

[4] 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第100页。

[5] 倪世雄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第61页。

[6] Lake, Davi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68. 2nd ed. 1991,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7]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 7-8, 1977, Little Brown, Boston.

[8] 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4-11页。

[9]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9页。

[10]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154页。

[11] 同[8],第11页。

[12] Palmer, R. R. and 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p.774, 1978,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3]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560页。

[14] Kegley, Charles and Eugene W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1995, Mcgraw Hill, Inc.

[15] 同[14]第167页。

[16] 同[8]第122页。

[17] 同[13]第563页。

(作者:陈剑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倪世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